



直面生产率

秘鲁钦切罗斯的一家杂货店。

爱德华多·劳拉、卡门·帕雷斯

拉丁美洲国家的收入停滞不前并非出于投资的缺乏，而是因为生产率低下

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在抵御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能力方面都胜过那些发达经济体。2010年，拉丁美洲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得以显著提高，超过4%，而像阿根廷、巴西和秘鲁这样的国家则以超过5%的增长率跃居前列。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预计人均收入增长率将减缓到每年不超过2%—3%的水平。保持这样的增长率水平并非是坏事，但是，这样的水平无法使这个地区能迅速赶上发达经济体，正如日本和韩国这样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曾经做到的那样，或像中国现在正在做的那样。

此外，由于历史上其增长率较低，在过去的50年中，拉丁美洲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实际上已经扩大。半个世纪以前，一个普通拉丁美洲国家的人均收入是美国人均收入的1/4，如今，这个数字是1/6。

尽管人们不断呼吁对这一地区进行更多的投资，然而，投资不足并非是其经济低迷的主要原因。拉丁美洲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是生产率增长缓慢，或者更准确地说，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缓慢。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经济体所生产的总的商品和服务同生产要素之间的比值——如资本、劳动力以及劳动者技能（见图1）。

关注生产率

忽视生产率的代价是高昂的。自1960年以来，假如拉丁美洲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同美国一样，那么，其今天的人均收入将会高出54%——当然，其人均收入将依然是美国的1/4（由于美国经济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此外，自20世纪早期以来，美国在世界收入排行榜中占有领先地位，所以，通常拿美国作为参照基准）。

这个地区的两个经济体——智利和哥斯达黎加在利用资源方面做得最好，但是它们的全要素生产率约为美国的75%。假如这个地区的一个典型国家达到了与美国一样的生产率，那么其人均收入将会增加一倍。而且，更高的生产率将会加大对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投资的刺激，这将会加快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差距。

实现更快的生产率增长相当复杂，而且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促进创新和技术开发。低生产率通常是无数的市场失灵和不利政策叠加所造成的意外恶果，这在发展中经济体中更加普遍——其中包括拉丁美洲地区。这些缺陷往往会弱化创新激励机

制、阻碍竞争、妨碍高效率公司的发展，同时会促进生产率较低的公司的存活和扩张。发展中国家可有多种途径提高其经济效率，其中包括倡导竞争、深化信贷市场以及改善税收和社会政策。

不仅仅是工业问题

对生产率和竞争力的分析往往倾向于仅聚焦于工业领域，这样就忽视了全局。

1970年，拉丁美洲地区的农业部门提供了40%的就业，它一直是这个地区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明星。与其他领域中所出现的情况不同，在过去的50年中，劳动生产率（这是唯一一个我们拥有详细数据的部门层次的指标）以每年2%或更高的速度持续稳步增长。这与工业领域，尤其是服务业领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的劳动生产率在20世纪80年代骤然跌落，且20年来一直停滞不前（见图2）。

工业化和经济繁荣常常有着必然的联系：工业革命将劳动者从农业和传统手工作坊转移到了生产率更高的工业制造领域，此后，发达国家才开始变得富裕起来。

20世纪下半叶，拉丁美洲国家曾试图遵循这条通向经济繁荣的发展路线，然而只取得了部分成功。高关税使公司不得不面向国内市场，而大多数的国内市场太小，无法促进竞争。推动工业政策和出口的力度普遍也不大，不足以吸引越来越多的迁移到城市的劳动者。相反，那些劳动者进入了服务领域。如今，这一领域雇用了有60%的劳动力。在由贫困到繁荣的发展道路上，拉丁美洲经济体跨越了历史发展模式，在中途直接跃变为服务型经济。

由于拉丁美洲的制造业部门雇用的劳动力仅占

总劳动力人口的20%，因此，即使解决了工业竞争力或技术落后等问题，其所发挥的作用也太小，尚不足以克服发展滞后的矛盾。将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东亚的水平，将会推动劳动生产率的全面增长——年增长从1.5%增至1.8%。假如拉丁美洲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水平与东亚持平，其总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可增加一倍以上，达到3.1%。要相应缩小与美国服务业85%的劳动生产率差距，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个差距与制造业部门的61%的差距相比要大得多。

小公司数量太多

每个国家的中小型公司的数量都超过了大型公司，但是拉丁美洲的极小型公司的数量过剩。例如，在美国，有10名（含）以下员工的公司占54%；而在拉丁美洲地区，小公司的数量要大得多：阿根廷84%的公司有10名（含）以下员工，在墨西哥和玻利维亚，这一比例超过了90%。

小型公司的生产率较低的现象更加普遍。在墨西哥全要素生产率分布中，处于底部10%的制造业公司的单位产量所需的资本和劳动力资源是处于顶部的10%制造业公司的五倍。这一差距要远远大于美国或中国的情况。墨西哥并非是拉丁美洲地区一个孤立的个案。即使是在萨尔瓦多和乌拉圭这样与众不同的国家，按世界标准测算，其公司间的生产率差距也十分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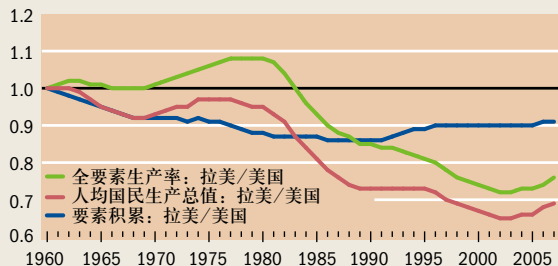
公司规模仅仅是该地区资源配置严重不当的原因之一。据估计，假如能够采取适当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配置方式，使生产率较高的公司获得发展机会，同时，使生产率最为低下的公司萎缩或消失，那么，总的全要素生产率就会从中大大获益。假如资源能够从生产率最为低下的公司转移到生产率最高的公司，则墨西哥的工业产值将会增加一倍；其余拉丁美洲国家的一般收益将达到约60%（基于谢和克列诺2009年的估算）。

图1

滞后的生产率，滞后的收入

自1960年以来，与美国相比，拉丁美洲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大幅滞后，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其相对于美国的人均GDP的下降。

（比率，1960年=1）



资料来源：帕雷斯（2010年）基于达乌德和费尔南德斯—阿利亚斯（2010年）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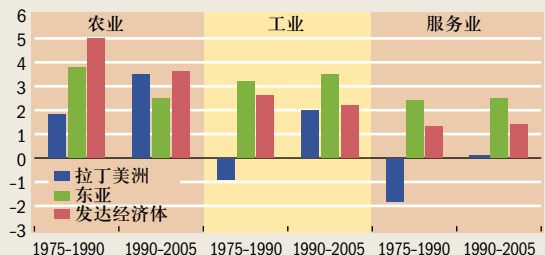
注：全要素生产率是指一个经济体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总数量与生产这些产品的生产要素之间的比值——如资本、劳动力以及劳动者技能。要素积累主要是指资本和劳动力等投入储备的增长。

图2

蒸蒸日上的农业

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相比，拉美地区唯有农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具有优势。

（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百分比）



资料来源：帕雷斯（2010年），基于蒂莫尔和德弗里斯（2007年）的文章。

注：劳动生产率是指每个工时的产值。

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制造业部门以外似乎存在更大的生产率改善空间。零售业有着巨大的生产率增长空间。制造业以及公用事业公司和金融服务公司等现代化服务行业的工作岗位固然更好，但却很难获得，因此，数百万的拉丁美洲劳动者转向零售业领域寻求工作。假如资本和劳动力能够从生产率较低的公司重新配置到生产率较高的公司，那么，墨西哥和巴

在拉丁美洲地区，只有具备巨额盈利前景的公司才会认为扩大规模，并超越一定的水平是值得的。

西的零售业劳动生产率可从15%上升到美国零售业劳动生产率54%的水平。许多其他服务行业也可达到类似的收益。

资源配置不当源自种种的市场失灵和政策缺失，这些因素给公司造成了不公平竞争的环境。这种资源的配置不当降低了生产率，因为这使低生产率公司占据了过多的市场份额，而与此同时却限制了具有较高生产率公司的发展——这也就是资源的重新配置可以产生如此巨大效益的原因所在。

这一点在服务行业体现得尤为明显，服务行业公司通常都是小型的非正规公司，即这些公司没有经过注册、不纳税、也不遵守政府的规定。有些政策能够容许逃税，容许逃避缴纳社会保险税款，这可以抵消这些非正规公司较低的生产率所带来的影响，使他们的业务得以持续运营，并吸收那些正规公司本可以更加高效利用的资源。

拉丁美洲经济体必须正视服务行业生产率较低的现实问题。该地区工业行业的发展机会相对较少——不仅是因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性的制造大国，而且还因为资本流入往往导致货币升值，这会相应削弱那些行业的竞争力。只要中国（以及其他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不敌拉丁美洲的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保持快速的增长步伐，那么，农业和原材料行业势必扩张。然而，这不会为拉丁美洲民众持续减贫和追求更高生活质量自动提供所需的就业岗位的数量和类型。提高服务行业的生产率是达到这一目标最有效的途径，原因有二：其一，服务行业雇佣的劳动者人数最多；其二，增强工业竞争力要求物流、运输、分销和通信等服务行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

多方面的政策缺失加剧了拉丁美洲地区低迷的生产率水平和经济发展。贸易、运输、创新和产业政策，再加上对中小型公司的扶持计划，所有这些都对生产率产生了不利影响（帕雷斯，2010年）。但是，金融和税收政策却受到格外关注，因为这些政策对公司的生产率产生巨大影响，决定了各种规模的高生产率公司将停滞不前还是向前发展。

生产率的提高需要信贷

拉丁美洲的金融体系已经解决了以前存在的诸多低效率现象，这些现象源自政府干预过多、监管不力以及渎职失察。拉丁美洲银行在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能够从容应对，相对而言，几乎毫发未损，这恰好证明了这些改进措施所带来的效果。但是，根据国际标准，拉丁美洲的信贷体系依然较小，所提供的产品十分有限。与20世纪80年代早期相比，许多国家的信贷体系都相对缩小了。

信贷不足解释了生产率的不均衡性，尤其对于中小型公司而言更是如此。因为他们无法借款，许多高生产率的公司无法扩张，许多低生产率的公司无法进行提高生产率所需的技术变革和投资。在哥伦比亚，在过去的十年中，小型企业获取信贷的额度增长了14%，这为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了50%的增长率（艾斯拉瓦等，2010）。

同时，信贷缺乏也损害了生产率，因为它弱化了遵守税收和劳动法规的激励机制——获得银行信贷通常要求遵守这些法规——从而降低了非正规部门的成本。扩大信贷的发放规模能够对就业正规化起到关键性的作用，2004年中期至四年后爆发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期间发生在巴西的情况就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卡特、帕雷斯和罗萨尔斯，2009年）。在此期间，给正规公司发放的贷款额度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上升到24%，具有正规就业合同的劳动者比例由38%上升到45%。这并非巧合。那些因投资和现金流需求而对信贷的依赖度最强的行业也正是那些劳动力正规化进程最快的行业。

稳定的信贷供应对于生产率的持续改善而言必不可少。突如其来的信贷紧缩会从两个方面对生产率造成长期性的损害。首先，它延缓新技术开发所需的投资；其次，它可迫使那些生产率较高却信贷受限的公司倒闭。对哥伦比亚的公司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小公司若想同大公司有同样的机会在信贷紧缩中存活下来，则其生产率须为后者的4.5倍。这有力地表明，信贷的突然缺失会对较小型公司带来沉重打击（艾斯拉瓦等，2010年）。假如信贷危机频繁发生，则高效率的小型公司得以存活并发展的机会更少。

尽管拉丁美洲经济体在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地震中得以保全，但是，更强的信贷稳定性在接下来将会发挥关键作用。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进行更好的金融市场监管和谨慎监管以保护金融行业免受冲击的影响依然任重而道远，尤其对于那些更加依赖外部融资及更易受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的国家而言，情况更是如此。

同时，大多数国家也必须加强对债权人财产权的保护，这样，银行可以凭抵押为中小型公司提供贷款。这或许是最难以做到的，但也是最为必要的，这个措施可使信贷体系对生产率的提高发挥更大的作用。

税收和生产率

同信贷不足一样，税收也是促成资源配置不当的主因，这导致了生产率下降和增长减缓。据世界银行《全球商业环境》的数据显示，拉丁美洲公司准备纳税申报单的过程每年需要平均花费320小时，与此相比，发达经济体只需177小时。哥伦比亚的公司相对幸运一些，它们花在这些事务上的时间比该地区的其他国家要少。即使如此，哥伦比亚的公司花在税收事务上的时间平均仍有208小时。在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公司在税收事务上浪费的时间介于600工时和2600工时之间。

由于税收体系相当复杂，而且较小型的公司对税收收入的贡献较小，因此，似乎有理由为它们创建专门的简化体系。17个拉丁美洲国家中有13个存在这样的税收体制，另外有两个国家的税务部门免除小型公司的税款。

但是，这些体系改变了促使公司发展至其最佳规模的激励机制。例如，简化的税收体制似乎对生产率有益，因为这些体制使小型公司免除了很多代价高昂的繁文缛节性工作，但是，这些体制实际上阻碍着小型公司进一步发展并超过作为免税标准的销售额或工资额门槛，因为，一旦超过这个门槛，所享有的利益将被取消，更高的税收将侵蚀它们的盈利。假如一家秘鲁的小型公司超越了这个门槛，其利润将会减少一半；对于一家阿根廷的公司而言，其利润将会下滑25%。在拉丁美洲地区，只有具备巨额盈利前景的公司才会认为扩大规模，并超越一定的水平是值得的。这就是为什么该地区中型公司数量如此之少，而许多规模小、生产率低的公司能够存活下来的原因之一。它们使用的资源如果用于更大型的公司，其利用效率会更高。

此外，因为税务当局征税的重点集中在大型公司，而且由于大型公司的企业所得税相当高昂（平均为20%，与此相比，发达经济体为16%），许多有发展潜力的公司并不愿意进行投资以提高其生产率，原因是它们将不会获取足够的收益。公司越大，其投资决策越易受到这些税收因素的影响。而且，投资越是集中在一些大型的公司，迫使该国政治体制和税务部门对其收入课以重税的吸引力就越大。

逃避缴纳社会保险加剧了不平等税赋和不平等税制所带来的有害影响。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仅有1/3的劳动者注册登记了社会保险。逃避缴纳社会保险税相当于对那些未缴税的公司（这些公司往往比那些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的公司规模更小、生产率更低）发放了补贴，同时也降低了生产率较高的小型公司进一步发展的积极性，因为它们害怕自己被列入当局的税收名单。同税收体制的问题一样，无论是通过推动针对微型企业和小型公司的专门社会保险机制，还是通过为非正规经济领域的企业所缴纳的社会保险

提供补贴，都会使生产率问题变得更加糟糕。扩大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才是正当途径，在一个被不平等所困扰的地区，有力的社会政策必不可少。但是，那些用心良苦却方法严重失当的补救措施促进了非正规经济领域的就业，从而损害了总的生产率。

简化、统一并实施适用公司的税收条款，此外，以一种不鼓励低效率行为的方式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所有这些措施对生产率的提高均大有裨益。税收和社会保险缴纳体制针对不同行业和公司规模以及其他差异性因素区别对待，这使资源配置发生扭曲。这样的税收和社会保险缴纳体制分散了本已稀缺的管理资源，给公共管理部门造成了额外的负担。

生产率无可替代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人均收入已落后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这并非因为该地区的民众工作不努力，也并非因为他们投资不多。而是因为，相对而言，该地区的生产率增速大幅下跌。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一些商品和初级产品的购买费用与相应的国际价格相比要低很多，这能提高生活水平。然而，过去50年的经验显示，这种战略显然不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更加高效的生产、创新、培训、调整、改革、试验、重新配置以及更加高效地利用工作、资本和土地。换句话说，必须要提高生产率。■

爱德华多·劳拉（Eduardo Lora）是美洲开发银行劳动力市场部门的首席经济学家；卡门·帕雷斯（Carmen Pagés）是该部门的主管。

参考文献：

Catão, Luis, Carmen Pagés, and M. Fernanda Rosales, 2009, "Financial Dependence, Formal Credit and Informal Jobs: New Evidence from Brazilian Household Data," IDB Working Paper (Washington: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Daude, Christian, and Eduardo Fernández-Arias, 2010, "On the Role of Productivity and Factor Accumul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DB Working Paper 131 (Washington: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Eslava, Marcela, Arturo Galindo, Marc Hofstetter, and Alejandro Izquierdo, 2009, "Scarring Recessions and Credit Constraints: Evidence from Colombian Firm Dynamics" (Bogotá: Universidad de los Andes).

Hsieh, Chang-Tai, and Peter Klenow, 2009,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4, No. 4, pp. 1403-448.

Pagés, Carmen, ed., 2010, The Age of Productivity: Transforming Economies from the Bottom Up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Timmer, Marcel P, and Gaaitzen J. de Vries, 2007, "A Cross-Country Database for Sectoral Employment and Productivity in Asia and Latin America, 1950-2005,"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Memorandum GD-98 (Groningen, The Netherlands: University of Groningen).